

论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化的作用

李惠康

(湖南科技大学 科研处,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化是抗日战争中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全国文化的策源地, 对全国各地抗战文化的生成、兴盛起了积极的作用。沦陷区文化界, 以救亡文学、救亡戏剧、救亡电影、救亡音乐等为热点的文化活动如火如荼, 深深地鼓舞着全国文化界, 她的发展, 为全国抗战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础。建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 坚持抗战文化面向人民大众, 激励民众的抗战热情, 提高民众的觉悟, 为全国提供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经验和样板。撤离沦陷区的文化人分散到全国各地后, 成为推动各地抗战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和“领头羊”。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沦陷区; 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2008)07-0172-03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 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的独立的一支延绵了几千年, 过去和现在都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文化只不过是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小朵浪花, 但她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瞬间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下, 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体现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历史画卷。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强烈的爱国情操, 甘愿为民族的复兴做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在日寇大举侵华, 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关头, 知识分子肩负起神圣的民族责任, 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和喉舌。

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化是抗日战争中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形式上和发展事实上差别较大, 如文化队伍的力量组合和成分构造、文化发展的组织、开展文化活动的环境等等, 都因不同的区别而情况各不相同。目前, 一般将抗战时期全国的文化发展分为三大板块, 即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大后方文化、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文化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陷区文化^[1]。划分这三大板块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地理上的区域性, 一是性质上的政治性。然而这三大板块文化, 不管形式上、发展事实上如何不同, 从总体上看有许多一致的地方。比如, 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和面临的斗争任务是相同的。

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 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化与抗战文化的精神当然也是一致的。沦陷区文化的发展对全国各地抗战文化的生成、兴盛起了积极的作用,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沦陷区是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 它为全国抗战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就文化战线而言, 配合抗战开展活动最先就从沦陷区开始, 而且, 其规模和声势立即就对全国产生带动作用。如上海沦陷区,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上海文化界行动起来, 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各种文化活动逐渐向反日抗暴的主题靠拢。1935 年底以后,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再掀高潮, 沦陷区文化又走在前列。1935 年 12 月 12 日, 上海文化界沈钧儒、邹韬奋等 270 余人发表救国宣言, 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 坚决反对伪组织, 要求抗日。27 日,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 到会者 300 余人, 再次发表宣言, 提出八项救亡主张, 要求“停止内战”, “武装全国民众”, “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同时向全国文化工作者提出五项要求: “(1) 大中小学的教师们, 迅速地站在学生前面, 领导学生救国运动; (2) 从事新闻事业的人们, 忠实地报告救国运动消息, 树立公正舆论; (3) 作家们, 本着各自的文化领域, 用各种方式, 激发大众斗争的意识, 建立正确的理论领导; (4) 反对文化专制, 反对文化界汉奸; (5) 全国文化界联合组成救

[收稿日期] 2008-05-10

[作者简介] 李惠康 (1968—), 男, 湖南湘乡人, 副教授, 硕士,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亡的统一战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2]。

沦陷区文化界,以救亡文学、救亡戏剧、救亡电影、救亡音乐等为热点的文化活动如火如荼,不仅使全国文化界深受鼓舞,而且也引起各地纷纷仿效,作用明显。

第二,沦陷区文化为全国提供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经验和样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民族危机下,文化为抗战服务是必然的趋势。基于爱国主义立场,文化人用不着动员,就会主动地将文化活动纳入抗战的轨道。但是,怎样使文化有效地服务于抗战,实际的经验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沦陷区文化以其独有的优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示范的样板。首先,必须建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只有广泛地团结一切爱国的文化工作者,才能充分显示文化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沦陷区文化人不仅以鲜明的团结意识呼喊文化界的统一,而且以实际行动,形成了统一战线的各种机构,为全国树立榜样。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10月,文艺界发表了《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并认为“在文学上,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3]在宣言上签名的有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巴金、张天翼、谢冰心等21人。而此,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建立,并为1938年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其次,文化为抗战服务必须坚持面向人民大众,充分发挥文化的宣传鼓动效能,激励民众的抗战热情,提高民众的觉悟。一些革命的电影歌曲,如《大路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都曾广泛流行。文学中的报告文学在一些进步报刊上逐渐出现,其中的优秀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洪深的《天堂中的地狱》等及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反映了人民的爱国激情。上述文艺作品,是救亡运动高潮的产物,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极大的鼓舞与动员作用。文化为抗战服务,为民众服务,是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化的基本走向,它使文化打破了民众的隔阂,从而使文化有机地与抗战融为一体。这条经验对全国抗战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一些地方许多文化人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主张,与沦陷区文化提供的经验不无联系。再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沦陷区文化界创造了许多文化为抗战服务的生动形式,还组织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等活动,都对其他地方产生了影响,相应的活动此起彼伏。

第三,撤离沦陷区的文化人分散到全国各地后,成为推动各地抗战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和“领头羊”。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结和追求民主的社会使命感。在抗战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抛弃对国民政府的幻想,对救亡途径做出新的抉择,寻找民族的新“支点”。

上海失守后,它的文化中心地位也随之失却,紧接着武汉一度成为文化中心,此后广西桂林也形成了文化发展的热潮,而在整个抗战期间,重庆和延安则是两个重要的抗战文化中心。这些在上海成为沦陷区之后的文化中心,都与撤离上海的文化人的加盟和推动有密切关系,他们将热闹一时的抗战文化,从狭小的亭子间、从繁华的大上海撤离到祖国的东西南北。

武汉文化中心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沦陷区上海文化的一次阵地转移。当时到达武汉的有影响的沦陷区文化人有郭沫若、茅盾、胡风、阳翰笙、田汉、冯乃超等人,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等团体组织,基本上都是以沦陷区撤下来的文化工作者为骨干,而且有些还是他们的倡导、推动下成立的。典型的“中华文化界全国抗敌协会”,就是由阳翰笙等人发起倡议,由胡风、冯乃超等人积极筹备组织成立起来的。从沦陷区撤退下来的电影工作者也进入了武汉成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批宣传抗战的新片子,推动了中国的电影事业。

武汉失陷之后,沦陷区文化人聚集重庆。他们中包括夏衍、于伶、石凌鹤、郑君里、葛一虹等人。另外,沦陷区的电影剧团也迁到重庆,充实了大后方的文化力量。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云集了来自全国沦陷区的著名文化人士,他们丰富的经验在推动重庆抗战文化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沦陷区的文化人对新四军各根据地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上海失陷以后,一批作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画家等文化工作者投奔新四军华中根据地。先后前往根据地的有蒋天佐、林淡秋、何士德、阿英、任钧等人,他们的加盟给新四军华中根据地的抗战文化注入了活动。他们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各种文化活力,如何士德创作了《新四军军歌》等歌曲,阿英创作了《新四军军史》等作品。他们所作的努力,在华中根据地的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对于急于寻找救国真理和道路的知识分子,延安成了众望所归的抗战热土,成了抗日救亡和流亡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1937至1938年,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一股历史潮流。抗战中仅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有4万余人。究其原因,是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是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的迅速发展,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卓越表现。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未

来和希望。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曾在一次讲演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延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的“喉舌”。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文化对全国的影响,这是由战争的特点决定的。战争毁掉了沦陷区文化的地位,但遏止不了抗战文化的生长。新的抗战文化中心的形成,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力量的重新组合和调整的必然结果。沦陷区文化人的撤离和流向,既是一场战斗的结束,又是一场战争的开始,他们离开了沦陷区,又在其他的地方重新开辟战场,使沦陷区抗战文化在新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这个基本事实显示了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化的独特意义,给我们以珍贵的启示:一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巨大的感召力。毛泽东在1939年6月明确提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党中央还作出了一个著名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各抗日根据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充分信任,组织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尽量照顾,思想上努力使其提高。抗大第二至第五期的知识分子中,被吸收入党的分别为70%、50%、70%和55%。1938年初,冀西根据地的9个县长,全是知识分子。可以说,中共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为广大知识分子确立自己的历史位置,表达救国之心,实现报国之志,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二就是抗日根据地的新型的人际关系有吸引力。许多老同志都说“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这些恰恰是广大知识分子所渴求的。

总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全民族凝聚成一股力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进行殊死搏斗时,沦陷区文化显示的作用和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日本侵略者忽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由此产生的强大战斗力,是他们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化虽然几经变迁,多有波折,它有过轰轰烈烈的辉煌,也有过寂寞无声的消沉;它有过高涨潮的亢奋,也有过低落期的迷茫。但这并不影响沦陷区文化在全国抗战文化中的总体地位。

[参 考 文 献]

- [1] 上海党史党建[J]. 2001 (6): 28
- [2] 大众生活(第1卷)[J]. 1936 (9): 11.
- [3] 文学(第7卷第4号)[J]. 1936 (1): 16

On the Role of the Enemy-Occupied Area Cultur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LIHui-kang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Anti-Japanese War of the enemy-occupied area in the whol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ulture. The culture is the source of the culture of resistanc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generated. Prosperity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District fall of the cultural sector in order to save literature, national salvation drama, save movies, music and other national salvation for the hot spots of cultural activities in full swing. Deeply inspired the cultural and her development as a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laid a spiritual found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ultural sector of the united front organization, adhere to the Anti-Japanese War-oriented culture of the masses of people, inspire people's enthusiasm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raising people's consciousness, as a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has provided services for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examples. Withdrawal of the enemy-occupied area of intellectual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promoting a culture war of resistance around the main force and "leader".

Key words: Ante-Japanese war period, enemy-occupied areas, culture, role

[责任编辑:曹金钟]